

出版人的話

《中國現代小說史》是夏志清教授名著 *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* 的中文譯本。上世紀六十年代，其英文原著將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帶入西方學術界的視野，並在英文世界開啟了中國現代文學這一新的研究領域；近20年後問世的中文版，又成為漢語世界現代文學史研究的啟蒙先鋒。作為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經典之作，其學術地位，歷久不衰。

本社重印《中國現代小說史》，不僅基於這本書在中國文學研究史的經典地位，更有藉此推動未來中國文學研究與批評的用心與期待。夏教授以融貫中西的學識，縱論從五四白話文運動至五六十年代中國小說的發展，其試圖建立整體文學史框架的視野和雄心正是今日學術專業化、碎片化時代最為缺乏的。他精於西方文學理論而又不被理論所縛，為我們反思當下文學研究的過度理論化和抽象化趨勢提供了啟示。此外，其所展示的批評家精神和個性化的文風筆意，在今天學院化規訓下也越來越難得一見。

本書英文版初刊於1961年，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。1999年由印第安那大學出版社出版第三版。最早的中譯本是1979年香港友聯版，其得以譯成刊行並在漢語世界發揚光大，劉紹銘教授居功至偉。2001年本社獲夏志清教授和劉紹銘教授授權，重新印行中文版，在友聯1979年版本的基礎上，增收王德威教授〈重讀夏志清教授《中國現代小說史》〉一文，該文原是王教授為本書英文第三版而撰的導論，由王教授親自譯成中文並授權刊登。

2013年12月29日，夏志清教授在紐約辭世。本社籌劃推出最新中文版，以誌紀念。此版將2001年版重新排版並全面訂正，增收紀念文字數篇，並特邀劉紹銘教授撰寫新序，以饗讀者。出版過程中蒙夏夫人王洞女士支持及劉紹銘教授再次襄助，深表謝忱。

本社出版《中國現代小說史》為著譯者唯一授權之中文版本。

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

2014年12月

中文大學出版社：具有版權資料

一介布衣：紀念夏志清先生

劉紹銘

夏志清先生於2013年12月29日在美國紐約市辭世，生年九十有二。先生名滿中外，著作等身，要紀念他，就他的著作議論固然適宜，但夏先生一生的趣聞逸事可多。若要側寫他多彩多姿的生活片段，絕不會有不知從何說起的困擾。

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我負責籌劃夏先生 *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* 的中譯工作，自此因公因私一直跟他書信往還，也多次拿過夏先生的著作和日常生活中的「花邊」新聞做過文章。如今先生「大去」，應就我個人所知對他的文學見解作一補充。

夏先生的《中國現代小說史》於1961年由耶魯大學出版。如果不是通過中譯本先後接觸到「兩岸三地」的華人學界，張愛玲今天那有如此風光？說起來沈從文和錢鍾書的「下半生」能再熱鬧起來，也因得先生的賞識，在《小說史》中用了史筆推許一番。

張愛玲三、四十年代在上海出道，作品總背上「鴛鴦蝴蝶」之名，只合消閒遣興。那年頭唯一有眼光賞識到張愛玲才華的是傅雷。他用迅雨筆名發表了〈論張愛玲的小說〉，斬釘截鐵的肯定《金鎖記》為「我們文壇最美收穫之一」。他說得對：《金鎖記》的人物「每句說話都是動作，每個動作都是說話，即在沒有動作沒有言語的場合，情緒的波動也不曾減弱分毫。」

傅雷文評，全以作品的藝術成就定論，沒有夾雜「意識形態」的考慮。夏先生是上海人，張愛玲在「敵偽」時期的上海當上了胡蘭成

夫人這回事，他理應知道。張小姐是否因此附了「逆」？他在《小說史》中隻字不提，只集中討論這位 Eileen Chang 作品的非凡成就，一開頭就用 F. R. Leavis 在《偉大的傳統》一書所用的無可置疑的語氣宣稱：「張愛玲該是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。」

夏先生這種近乎「武斷」的看法，當然「備受爭議」，而且這種爭議，可能會無休無止的延續下去。反正夏先生的說法，也不過是「一家之言」，我們自己各有取捨。《小說史》中譯本初版於 1979 年，夏先生特為此寫了一個長序，特別點出自己作為一個文學批評家與文學史家的工作信念。那就是對「優美作品之發現和評審 (the discovery and appraisal of excellence)」。這個宗旨我至今還抱定不放。

夏先生大半生的「職業」是中國文學教授；但他「前半生」所受的教育和訓練卻是西洋文學。他在上海滬江大學英文系畢業，在北京大學英文系當過助教，後來得到留美獎學金到耶魯大學念研究院，用三年半的時間取得博士學位。那年頭的美國研究院，念文科的總得通過兩三種外語考試。記得夏先生所選的外語，其中有拉丁文和德文。如果夏先生不是資質過人，在大學時勤奮自學，一早打好了語言和文學史的根柢，不可能在三年半內取得耶魯的博士學位。

不難想像，像夏先生這樣一個有高深西洋文學修養的人，為了職業上的需要再回頭看自己國家的「文學遺產」時，一定會處處感覺「若有所失」。1952 年他開始重讀中國現代小說，發覺：

五四時期的小說，實在覺得它們大半寫得太淺露了。那些小說家技巧幼稚且不說，他們看人看事也不夠深入，沒有對人心作深一層的發掘。……現代中國文學之膚淺，歸根究柢說來，實由於對其「原罪」之說，或者闡釋罪惡的其他宗教論說，不感興趣，無意認識。

夏先生讀唐詩宋詞，不時亦感到「若有所失」。他認為中國文學傳統裏並沒有一個正視人生的宗教觀。中國人的宗教不是迷信，就是逃避，或者是王維式怡然自得的個人享受。他讀中國詩賦詞曲古

文，認為「其最吸引人的地方還是辭藻之優美，對人生問題倒並沒有作多深入的探索。即以盛唐三大詩人而言，李白真想喫了藥草成仙，談不上有什麼關懷人類的宗教感。王維那幾首禪詩，主要也是自得其樂式的個人享受，看不出什麼偉大的胸襟和抱負來。只有杜甫一人深得吾心，他詩篇裏所表揚的不僅是忠君愛國的思想，也是真正儒家人道主義的精神」。

夏先生「明裏」是哥倫比亞大學的中國文學教授，「暗地」卻私戀西洋文學。這本是私人嗜好，旁人沒有置喙餘地——只要他不要在學報上把中國文學種種的「不足」公佈出來。但這正是他在“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: Its Reception Today as a Product of Traditional Culture” (1990) 一文所幹的別人認為是他「吃裏爬外」的「勾當」。身為哥大 Professor of Chinese，若有學生前來請益，夏老師理應給他諸多勉勵才是，但我們的夏老師卻歪想到古希臘文明輝煌的傳統，居然說“would not hesitate to advise any college youth to major in Greek”，他是說會毫不猶豫的勸告任何大學生主修希臘文。十九世紀俄國小說，名家輩出，力度振聳發聵。為此原因，夏老師也會毫不猶豫勸告來看他的學生主修俄國文學。難怪「國粹派」的學者把他的言論目為「異端」。

夏先生第二本專著《中國古典小說》(*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: A Critical Introduction*) 1968年在哥大出版社出版。書分六章，各別討論《三國演義》、《水滸傳》、《西遊記》、《金瓶梅》、《儒林外史》和《紅樓夢》。這六本說部，一點也不奇怪，夏先生評價最高的是《紅樓夢》。但隨後的十多二十年，他對中國傳統文化和社會的了解逐漸加深，對《紅樓夢》的看法也相應作了修改。這裏只能簡單的說，夏先生對故事收尾寶玉遁入空門，作為看破紅塵的指標極感失望。當然，夏先生的看法多少是受了杜斯妥也夫斯基扛鼎名著《卡拉馬助夫兄弟們》的影響。

夏先生用“docile imagination”一詞來概括中國文人創作想像力之「柔順」。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的老調，唱多了，別無新意。寶玉出家，不是什麼知性的抉擇，步前人後塵而已。在夏先生的眼

中，若拿《卡拉馬助夫兄弟們》跟《紅樓夢》相比，自然是前者比後者更能「深入靈魂深處」。這麼說來，夏先生為了堅持“the discovery and appraisal of excellence”的宗旨，恐怕要背上「不愛國」的罪名。

夏先生的言論，激奮起來時，有時比魯迅還魯迅。我們記得1925年《京報副刊》曾向魯迅請教，提供一些「青年必讀書」給讀者參考。魯迅一本正經的回答說：「我看中國書時，總覺得就沉靜下去，與實人生離開；讀外國書——除了印度——時，往往就與人生接觸，想做點事。……我以為要少——或者竟不——看中國書，多看外國書。少看中國書，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。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『行』，不是『言』。只要是活人，不能作文算什麼大不了的事。」

夏先生在〈中國文學只有中國人自己講〉說的話，世間若還有「衛道之士」，看了一定會痛心疾首：「洋人看中國書看得少的時候，興趣很大；看得多了，反而沒有興趣了。Arthur Waley、Ezra Pound翻譯的中國古詩，看的人很多，人家說：就是好！翻譯得多了，就沒什麼好了。小說也一樣，《西遊記》翻譯一點點，人家覺得很好，後來多了以後，就覺得很煩，中國人不覺得什麼，洋人就覺得長，而且人名都差不多，看不下去。所以，中國文學弄不大，弄了很多年弄不起來，要起來早就起來了。法國的《包法利夫人》大家都在看，中國的《紅樓夢》你不看也沒有關係，中國沒有一本書大家必須看。」

歷史學家唐德剛教授本是志清先生好友，看了夏教授這種言談，精讀《紅樓夢》的唐先生受不了，認為老友「以夷變夏」，寫了〈紅樓遺禍——對夏志清「大字報」的答覆〉一文，發表於臺灣的《中國時報》，內有18個小標題，其中有「瘋氣要改改」、「以『崇洋過當』觀點貶抑中國作家」和「崇洋自卑的心態」這三條。

這場唐、夏二公就《紅樓夢》價值之爭議，其實開始前就有結論，那就是二者不可能分勝負。唐先生在美國受教育，以英文寫作，他最熟悉的西方經典，自然是史學範圍。他閒時或會涉獵西方文學作品，但對他來說這只是「餘興」，這跟志清先生在這門功課上

作業之勤、用情之深根本不可同日而語。看德剛先生的年紀，諒是抱着《紅樓夢》吃喝做夢那一代的書癡。既是平生至愛，那能讓夏某人「貶」其所愛？

本文以〈一介布衣〉為名，因為我實在想不出一個跟內容貼切的題目。六十年代初我到紐約拜望夏先生時，他帶我到他的家去坐。他的家就是哥倫比亞大學教職員的房子。隨後幾次拜訪，他也是在「家」接見我的，只是「家」的面積比初見時略為寬敞，想是因年資增長而得到的禮遇。夏先生除了做老師討生活和替報章雜誌寫寫文章賺點零用錢外，想來再沒有什麼發財能力。說他是「一介布衣」，應該沒有錯。

中文大學出版社：具有版權資料

中文大學出版社：具有版權資料

2015 年再版序

劉紹銘

夏志清教授的《中國現代小說史》的英文原著於1961年由耶魯大學出版。香港友聯出版社的中譯本於1979年面世。友聯早已結業多年，《小說史》亦絕版多時。為了使這本錢鍾書稱為「文筆之雅、識力之定，……足以開拓心胸，澡雪精神」的經典之作能以繼續流傳，中文大學出版社決定重排重印《小說史》。

《小說史》初跟讀者見面時，沈從文、錢鍾書和張愛玲等作家尚在人世，今已先後作古。現在難得重排，我們把當年在他們的「生年」後留的空白一一填上。（在此得附帶說明，有些作家的生年是難以確認的，像丁玲就是一個例子。）重排更給我們一些空間處理「技術問題」。譬如說，友聯版的註釋和參考書目的次序數碼，原來都用中文數字，現在一概改為阿拉伯數字。

《小說史》的原文是英文，譯成中文，常常遇到論者所說的dynamic equivalent問題。志清先生把曹禺的《雷雨》、《日出》和《原野》三個劇本稱為“essentially of the order of the well-made melodrama”。這句話的中文版本是「他初期三部劇本，基本上還屬於認真創作的通俗劇(melodrama)的範圍。」《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》給“melodrama”的解釋是：“a story, play or novel that is full of exciting events and in which the character and emotions seem too exaggerated to be real.”辭典給這個名詞的中譯是：「情節戲」、「通俗劇」。有些辭典還譯為「鬧劇」或「情節戲」。

從《雷雨》的內容組合看，上列各家的譯文都可視為一種“dynamic equivalent”，雖然早年的文史家慣稱《雷雨》這種「文明戲」為「話

劇」，以別於「京劇」。「通俗劇」一詞，容易誤導，怕跟「低俗趣味」混為一談。其實《雷雨》手法儘管誇張、趣味儘管濫情，但如果放在民初的時代背景來觀照，此劇其實非常一本正經，嚴肅得像一齣反父權、反封建的現代教化劇。《小說史》遇到這類名詞翻譯疑難，我們覺得唯一合理的解決方法是在譯文後加上夏先生用的英文原文。就像我們處理「通俗劇」(melodrama) 這個例子一樣。

最後一個要交代的事情是有關序言和附錄的安排。《小說史》的編排，先得感謝中文大學出版社沒有給我們篇幅的限制，所以在2001年版本收錄的序言和附錄，除了〈1958年來中國大陸的文學〉這一篇因為資料明顯過時抽掉外，其餘都得以保留。序言方面，除了夏志清和王德威兩位先生分別給2001年版本寫的原文當然保留外，我收入了自己寫的短文〈一介布衣〉用作代序。附錄的新稿，都是我驚聞夏先生逝世消息後引筆直書的肺腑之言，分別是〈名世與傳世〉和“Remembering Professor C. T. Hsia”兩篇。

新版《小說史》能夠順利如期完成，有幸得到大學出版社各同事熱心而專業的幫忙。特別是業務經理黃麗芬女士。從再版計劃一開始，她即挑起與本書業務和編務有關的穿針引線工作。我們對她的貢獻感激得實在一言難盡。另外一位我要特別鳴謝的是彭騰女士。這位copy editor是《小說史》的責任編輯。這本書自1961年出版後，我閱讀、引用和翻譯已前後經歷了半個世紀。當年一直沒有照顧到的一些技術問題，現在經Rachel一一提點，已逐一改正過來。俄國作家Fyodor Dostoyevsky (1821–1881) 早前的中文音譯有多款，現在已經統一稱為「杜斯妥也夫斯基」。另外有關俄國人名的音譯(transliteration)，我們保留了當年的拼法，不用現時流行的拼法。譬如說，從前的Sophia Perovskaia，今天是Sophia Perovskaya。我們沒有「破舊立新」，保留了Sophia的原貌。謹此對Rachel這位「責任編輯」的幫忙表達謝意。

2014年10月15日

劉紹銘識於香港嶺南大學

2001年版序

劉紹銘

夏志清教授的《中國現代小說史》(下稱《小說史》)英文原著，1961年由耶魯大學出版。那年我剛到美國唸研究院。先師夏濟安教授送了我一本。我通宵翻閱，對志清先生許多自成一家的看法，佩服極了。當時想到，這樣一本著作，若有中文譯本，必會石破天驚。

中國學者用外文寫的研究中國學術的著作，早晚都應該有個中文本藏諸名山的。不是自己動手，就應由晚輩代勞。

在美國教書，要保差事、或立江湖地位，當務之急是用英文著作出版。在美國當研究生，當務之急是為了學位而趕功課。我雖早有把夏先生扛鼎之作中譯的打算，奈何求學期間一直騰不出時間、打不起精神來從事這麼一個龐大的翻譯計劃。

1968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英文系任教。安頓下來後，開始構思翻譯大計。得到當時主持友聯出版社編務的林悅恆兄表示支持後，即動手聯絡志清先生的友好和我自己舊日的同學，邀他們參加翻譯工作。

這些當年共襄善舉的朋友，在本書各篇章的開頭都留下芳名。謹在此向他們再致謝意。

《小說史》的編譯工作，前後做了四年。1973年我交了稿給友聯出版社，但因學術著作的市場需要不及中小學教科書來得那麼十萬火急，此書一直拖到1979年才正式上市。林悅恆兄一介書生，面對

市場現實，除了跟我乾着急外，也一籌莫展。際此《小說史》再版之時，鄭重跟他說聲謝謝。

七八十年代的臺灣，對三十年代文學，一直採取「保持距離、以策安全」的態度。八十年代末，曙光初露。主持《傳記文學》的劉紹唐先生默察當時環境，覺得該是「引進」《小說史》的時候了，乃毅然安排此書在臺灣出版。

臺灣的讀書風氣，也教香港人羨慕。傳記文學版的《小說史》在1991年上市。據紹唐先生告訴我，他出版社的書還未釘裝，市面已見一車一車的翻版書在路邊賤價推銷。

《小說史》的英文原著1999年由印第安那大學再版。王德威教授為此版本寫的導言，今由他自己翻譯成中文用作本書的序文。謹在此向王教授致謝。

夏志清教授這本著作，成書40年，若無知音，斷不會一版再版。我在〈夏志清傳奇〉*一文中，作了扼要交代：

夏教授時發諤諤之言，不愧為中國文學的「異見分子」。《小說史》對張愛玲另眼相看，已教人「側目」。但更令「道統派」文史家困擾的，是他評價魯迅的文字中，一點也看不出對這「一代宗師」瞻之在前、仰之彌高的痕跡。

《小說史》今天能一版再版，不因其史料豐富（因其參考資料早已過時），而是因為作者的「史見」四十年後仍不失其「英雄本色」。此書既「揚」了一個「小女子」的名聲，也「顯」了一個「才子學究」的小說家地位。錢鍾書今天在歐美漢學界享盛名，絕對與受夏志清品題有關。

中國現代小說史的「英雄」，給夏志清重排座次，出現了不少異數。一些向受「冷落」的作家，自《小說史》出版後，開始受到歐美學者的重視。如蕭紅、如路翎。沈從文在三四十年代本來就薄有文名，但其作品受到「另眼相看」，成為博士

*見〈夏志清傳奇〉，《信報》，2001年6月16日。

論文和專題研究題目的，也是因為《小說史》特闢篇幅，對這位「蠻子」另眼相看的關係。……

夏志清的〔論點〕，算不算「離經叛道」？當然是。

難得的是他為了堅持己見而甘冒不韙的勇氣。他的英文著作，大筆如椽，黑白分明，少見「無不是之處」這類含混過關的滑頭話。

他拒絕見風轉舵，曲學阿世。也許這正是他兩本論中國新舊小說的著作成為經典的原因。

友聯版的《小說史》，早已絕版多時。中文大學出版社現決定再版，使各家院校中文系的老師和同學從此多了一本參考資料，實功德無量。陸國燊先生和曾誦詩女士玉成其事，特此致謝。

2001年8月29日 識於嶺南大學